

编者寄语

清明节是通往中华文化丛林的一条幽径。

说起清明节,你心中想到的古诗词是什么?我想应该是“清明时节雨纷纷,路上行人欲断魂。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

前半段,追思、缅怀。后半段,继续生活,不颓废,悲伤中隐现诗情画意。

在中国文化中,清明节是现实世界与彼岸生活的一次连接、关照、交汇、握手。

是人们内心深处的一份沉痛、一抹温柔,是人们逝去之人、过往之事的唏嘘感慨。

作为最重要的传统节日之一,清明节具有强大生命力,它不仅是人们祭奠祖先、缅怀先辈的节日,也是中华民族认祖归宗的桥梁,更是一个远足踏青、亲近自然的春季仪式。

中华民族的性格,重视孝道、慎终追远。清明节充分体现了中国人感恩的道德意识,这种文化也是中国几千年来和谐稳定发展的一大精神源泉。

凭借这个节日,古人与今人,前人与后人,彰显、传承着生生不息的代际关系。由此,我们更加确信,人与人、人与自然,是和谐共存的。

作为春季节日的典型代表,清明节具有非常丰富的文化内涵。既是“节气”,也是“节俗”,其内在的文化关联,不仅体现在血脉上,也展示在文脉上。

明代张岱在《扬州清明》中说:“城中男女毕出,家家展墓。虽家有数墓,日必展之,故轻车骏马,箫鼓画船,转折再三,不辍往复。监门小户,亦携着核钱,走至墓所,祭毕,席地饮膳……余所见者,惟西湖春,秦淮夏,虎丘秋,差足比拟。然彼皆团簇一块,如画家横披,此独鱼贯雁比,舒长且三十里焉,则画家之手卷矣。”足以可见是多么热闹,同时,也是那个时代政治、经济、社会、生活的一个生动剪影。

鼎鼎大名的《清明上河图》描绘的就是宋代盛世清明图景,里头传递的信息,也是海量的。

春分过后到清明。春的气息愈加浓烈,到处生机勃勃,人们追思先辈,远足踏青,不也是顺应天时、安顿身心的一种行为方式?

且听风吟

春风吟

冰消雪化借东风,芳草离离柳色融。才染枯枝桃未赤,又催玉户杏先红。推云笼雾甘霖降,送润开窗燕子冲。早起农夫身影远,栽蔬播谷步匆匆。

清明忆父亲

清明,是春天的清明是万物复苏的清明是写满哀思的清明是父亲的清明

四十年前那个寒冷的春天父亲依依不舍地离开我们去了那个生死永诀遥远的地方我依然觉得父亲就在我的身边每当闭上眼睛就能看见他慈祥的笑容

父亲一生与土地结缘农民的质朴和憨厚渗透进他身体的每一个细胞在那个充满贫瘠的年代他用勤劳和韧性呵护儿女们茁壮成长他走了,但永驻在我们思想的深处融入我的血液

六盘山副刊 敬请原创 首发优先 投稿邮箱:nxrbpls@126.com

N岁月

在《朔方》文学编辑部的往事

□ 李唯

熬到2021年,我也要算一个资深的电影工作者了。这一年,我的新电影《我的父亲焦裕禄》在宁夏银川拍摄并在全中国上映,这是我的第八部电影,作为一个从文学刊物的编辑跨界转行的影视编剧,有八部电影上映,其中还不乏在全国有所反响,如《黑炮事件》《美丽的大脚》《泥鳅也是鱼》等,此外还有十几部电视剧在央视及各大卫视频道播出,我自以为这个跨界转型成绩还是及格的,证明文学编辑完全也能从事其他艺术门类工作。正在此时,我看到了《北京文学》关于编辑部往事的征文,遥想起我的过往,不禁心潮澎湃。

1978年冬末初春的一天,我在宁夏银川市的省级文学刊物《朔方》做小说编辑,这一日,彤云密布,黑暗,是那种令心情不爽的天色,我一个人在小说组偌大的办公室里看稿。我由复旦大学中文系毕业分配边疆来这家杂志社就职,还是菜鸟新人,就得多干活儿。何况我还没结婚,我也无家可回。也正因此这一份独自留守,我和我要记述的这个人有了缘分上的交集。

应该是下午了,天色更暗,开始有零星小雪飘落,很冷。有人敲小说组的门,接着一个人披着一身雪花闪了进来,他冻得瑟瑟发抖,穿一件很破的棉袄,拦腰系一根草绳,宁夏人把这叫做草腰子,你完全可以根据这件棉袄和这根草腰子把他归到乞丐那一类中,他说他是从银川市远郊南梁农场来的,今天赶大车走了一上午和一中午来市里拉化肥的(或者是拉种子的?)

我记不清了),顺便来送一稿他刚写的小说。他一直在哆嗦,除了冷,还有业余作者见到编辑的惶恐。

我把小说留下,记下他的通信地址,告诉他,我看完后,会跟他联系。然后我请他快回去吧,天越来越黑,他赶车回去还要走几十公里路哩。

他走,神情期期艾艾地,欲言又止。最后他鼓起勇气说:“李老师(他特别问了我的名字),您要大米吗?”

他说他的大车上有一袋大米,是今天早上出发时特地放到车上的,他在农场种田只有这个,他想把这袋大米送给我。

我已经不记得我当时是怎么回答他的了。我肯定是回答了他的,我回答的核心意思肯定是不,我不是有多高的觉悟,因为我没有结婚没有老婆,要了他的大米谁来给我做饭呢?我也不会做饭。我的这个回答,后来被文学界的各路人马演绎成了各种版本,其中最为辉煌的是我豪壮地说:“我不要大米我要人才!”我今天可以负责任地告诉文学界:我绝没有说过这种话!我不要他的大米纯属我当时没有一个人女人可以给我做饭吃。

我没有要他的大米,他很失望,我看出他很失望,他告辞的时候,在暗暗地叹气。大概他以为我不要他的大米他的小说也完蛋了。

我看着他冬日飘着雪花的黄昏里蹒跚地走去。他叫张贤亮,几年后蜚声全国文坛的人。

他赶着大车来的南梁农场是宁夏的劳改农场,他当时还是劳改犯,还没有被彻底平反。他拿来的这篇小说叫《霜重色愈浓》,这是自十九岁因诗歌《大风歌》被逮捕判刑坐牢二十三年之后重新拿起笔来写的第一篇作品。我没有要他的大米但这篇小说我给他发了,发在《朔方》上,哪一期我记不得了,当时的《朔方》还叫《宁夏文艺》。

从这篇小说发端,张贤亮以令我眼晕的速度一发而不可收,他在《朔方》连续发表了四篇小说后,又拿出来一篇,这篇又是我做他的责编,但不是我一个人,是三人,还有老编辑路展老师和我在复旦的同班同学杨仁山。张贤亮的这篇小说奠定了他的文坛地位,这篇后来获全国小说奖,又被谢晋导演改编为电影上映、全国爆红,这篇小说是《灵与肉》,改编的电影叫《牧马人》。这是我最后一次做张贤亮的小说责编,从《灵与肉》开始,张贤亮和《朔方》的蜜月结束了,从此大火的他开始走向全国,《朔方》再也拿不到他的作品,他开始属于更大牌的刊物,如《收获》《当代》《十月》等。我和《朔方》的同仁们欢迎张贤亮向着更高远的天地飞翔。

张贤亮和我,和《朔方》编辑部的其他关系依旧继续,张贤亮和我也成了忘年交,我们无话不说,并且经常相互调侃,亲密无间,张贤亮后来平反也调入了《朔方》,和我成了同事,四十四岁的他生平第一次结婚,他娶的是《朔方》的女编辑,这位女编辑还是我复旦中文系的同学冯剑华,小

冯比我大几岁,是我的大姐,他们结婚的时候,因为发展速度太快,张贤亮刚调来几天就把小冯拿下,文坛都知道老张小说写得好的同时也是撩妹的高手,编辑部同仁便凑了一副对联献给他们,上联是:昨天还是游击队,下联是:今日已成正规军,横批:速战速决。这副对联以及横批就是我一手贴到张贤亮新婚洞房门楣上的。多少年之后,我和张贤亮伉俪还说起此事,我们三人一同大笑。

再后来,张贤亮愈发地火,成为宁夏文联主席,当了我的领导。他见了我自然再不哆嗦,大米之类的话也再不说,同时也因为熟悉和亲密到不彼此,他开始时不时不客气地拍拍我的脑袋,吩咐我:“李唯,去给我买份羊杂碎来,再买一个饼子!”他喜欢吃羊杂碎就饼子。我便去买。我有时候还调侃他:“贤亮你当初答应要给我的大米呢?拿来!”他不客气地回复我:“滚!”

再再后来,张贤亮死了。贤亮兄如今已故去七年,兄与我,与《朔方》编辑部的关系,这一页已经彻底掀过去了,但贤亮兄的一颦一笑,我们在一起时的点点滴滴,常浮现在我的心中。我的身份也从《朔方》的编辑做了编剧后来还做了《北京文学》的小说作者,这些年,我在《北京文学》发表了四部中篇,两次获得了《北京文学》奖,《北京文学》的编辑们开始哺育我、修正我、拔擢我、奖掖我,他们比我在《朔方》做编辑时做得好,他们是杨晓升、师力斌、白连春。我感谢他们。

百姓纪事

扁担情

□ 牛海龙

在我的记忆里,小时候的家里,几乎任何时间、任何角落都能见到扁担。挑水、挑种子、挑肥料、挑稻谷、挑泥土、扛石、扛木头、扛农具……父亲的所有倾注与硕果,都与扁担密不可分。扁担是扁圆长条形的,有用木头做的、也有用竹子做的,外形简朴自然,酷似“一”字,也有“月牙”式的翘扁担,挑东西比较省力些。

小时候的乡村,找不到一条像样的道路,田间、沟壑、山坡上都是羊肠小径,扁担是父亲一生干活最忠实的伙伴。养家糊口时,是他谋求生计的工具;从事工作时,是他做人处世的标尺。父亲出身贫寒,8岁时他的祖父去世,13岁时我的伯父病故,祖母艰辛地拉扯父亲生活、成长。后来我们兄弟姐妹相继出世,家庭负担更重。父亲靠的就是那根扁担,颤得像翅膀一样,扁担带着人走,不快也得快,起早贪黑地、日复一日地、默默无闻地劳作。父亲当工人,重活、累活、脏活他都带头干,修堤筑堰扛石头、挑泥巴,“双抢”时节担稻谷、扛打谷机,都少不了他的身影。特别是父亲挑水、担柴的动作让我记忆犹新。我的家是典型的南方丘陵地区,那时候没有煤气、煤炭,连木柴都没有,烧水做饭用的是稻秆、毛草。为了解决柴火问题,父亲经常与乡亲们到20里开外的毛仔斛去砍柴,一大早就出去,一根扁担、一顶斗笠、一把砍刀、一双稻秆绳,便匆匆上路了,父亲往往是第一个砍满一担柴的,太阳快落山才能回来。干农活,好像是父亲的终生职业,从未停歇;60多岁了,父亲尽管不再种田,但依然在旱地种辣椒、西瓜、生姜等,这些作物需要保湿,父亲早晚挑水浇灌,多的时候一天下来要挑上百担水,真是“夏担三伏不觉热,冬挑三九不言寒”。

上世纪80年代,父亲挑烟叶、扛榨压机,合伙制作烟丝——那时走村进巷,收购黄烟叶,榨压、刨丝,打包挑到集市赚点差价。上世纪90年代后,农民在自留地、联产责任田里种植水稻、西瓜、生姜等经济作物,栽培时需要育苗、培植、反复施肥,耕作都要肩膀扛,收获时要把田地里挑到收购的车上,挑到晒谷场、挑到集市……特别是后来赶集,每次采摘辣椒(多的时候六七十斤),早早吃了早饭,戴上斗笠,穿上解放鞋,系上已经白里透了黄的围布,挑起扁担、小菜篮、杆秤,走12里以上的路,扁担左肩换右肩,右肩换左肩不知多少次,9点多钟才能赶到集上,半斤、1斤……卖呀卖,最快也要卖到中午之后,下午三四点钟回到家里,吃完简单的“午饭”,又担着尿桶,重重复地为西瓜、辣椒、生姜挑水洗灌,直到天黑得伸手不见五指才回来。

父亲35岁生出的我,也许是“老仔”的缘故,他对我特别疼爱。我小时候,右手摔坏了,不能动弹,父亲十分着急。为了帮我治病,他一边干活,一边带我四处求医。每次出发时,父亲将我抱进竹箩里,扁担挑上肩走上寻医的征程。儿时的我哪能体会父亲看病的艰辛,只是喜欢在箩筐里仰视着父亲,看着雨点大的汗珠从父亲精瘦的脸上滚落。竹箩随着父亲有节奏的脚步摇摆,我竟然非常享受,常常是坐着也能睡着。辗转求医,做了小手术……在父亲的呵护下,半年后我痊愈了。

多少年后,每当端详父亲用过的那根扁担,仿佛看到父亲和蔼可亲的面容,仿佛看到父亲勤劳朴实的气节,仿佛看到父亲艰辛努力的品格。如今,那根扁担虽然形单影只,悄然无声地伫立在墙角,但那种无私奉献、奋斗进取、百折不挠的精神,在我心里永不磨灭。



思念

桂涛 摄

我每年都回固原好几次,因为我的奶奶长眠于此。只要我回来,我就要去看看她。

奶奶三十八岁时,我娘做了她的二儿媳。进门那天,我奶奶就当所有人的面说:秀梅从小没了指娘,谁也不能让她受气!然后对我娘说,你还有我这个娘哩!奶奶没把娘当外人看。

后来,在党的好政策引导下,奶奶带着儿子儿媳、孙子种药材、养家畜、日子越过越红火。奶奶说,人闲了不好,手里要有个干的呢,不干活计人就荒废了。我们家新盖的房子,向南都是窗户,看过去像一列火车。我娘特意给

守望

□ 胡静

奶奶挑选了朝南的卧室,这样拉开窗帘能看见远处的山和西海子。奶奶稍微年龄大一点,生活热情更高涨,在屋前屋后种植了很多的花花草草,她总是坐在有花的地方晒暖暖、纳鞋底,我娘总会拿着个小板凳依偎在奶奶旁边,很享受地听奶奶唠叨。奶奶见不得别人落泪,左邻右舍谁有个过不去,她都看在眼里,能帮就帮,左邻右舍都念她的好。

小宝茶话

宁夏文学的魅力所在

——从新时期宁夏文学谈起

□ 丁良龙

体、阔大、历史纵深感的变化,非常值得肯定。季栋梁先生是土生土长的宁夏人,其作品《西海固笔记》以作者20多年的亲身经历再现了家乡脱贫攻坚的沧桑巨变。西海固脱贫攻坚中呈现出很多动人的故事,有扶贫、支教、支医等,展现西海固人民与贫穷作斗争的决心和志向。

李进祥先生的《讨白》作为鲁奖的参选作品最终落选实在可惜。《讨白》这一文从结构安排上看颇具欧·亨利风格,结局出乎意料也在情理之中。人物性格方面体现了人物内心强烈的矛盾感,这使人物形象更加丰满。故事整个进程揭示战争的残酷,赞美人性的真善美。李进祥先生英年早逝,实为宁夏文坛乃至中国文坛的一大损失。

郭文斌先生的作品风格可以用天高云淡来形容,他的作品贴近生活,让人读起来感到很享受。我们有过几次接触,他的作品就像他的一样让人感到十分温和。他的作品《吉祥如意》写的是端午,从早晨起来“往房门框上插柳枝”起,接着摆供品、祭祀、绑花绳,姐弟俩上山采艾草。这部作品是诗化的生活,需要我们带着诗美的眼光去看得最美的生活。《朔方》是宁夏的省级文学刊物,它诞生在

宁夏这片土地,就注定了它的不平凡。《朔方》一直是宁夏作家的创作主阵地之一,在这片沃土的栽培下,鼎盛时期宁夏作家的作品成了全国大刊《人民文学》《小说选刊》等的“免检作品”。随着宁夏作家的成长,《宁夏日报》六盘山文艺副刊、《黄河文学》等刊物成为宁夏作家创作的又一沃土,这些文学刊物的出现,使宁夏的文学新人有了更多展示自我的平台。

宁夏文学的乡土气息从石舒清开始,马金莲达到相当高度。宁夏文学界有张贤亮、石舒清、郭文斌、李进祥等杰出人才的引领。宁夏作家本土创作的天地越来越宽广。宁夏的风土人情造就了宁夏作家的成功,促进了他们的成长。在他们的影响下,新生的宁夏青年作家会像雨后春笋般飞速成长,宁夏文学的发展会越来越越好。

我们生在这里、长在这里,自然会情不自禁地讴歌这里。我们感受过这片土地的贫瘠荒凉,见证它的发展与兴盛。我们用文字记录这一切,用优质的作品为宁夏的文学发展添砖加瓦。

作者简介:丁良龙,笔名帅龙,90后。塞上江南山中人,喜书画、摄影、写作。